

订报刊琐记

刘付德金

家里书房和杂物房的书籍、报刊堆积如山,这是在校求学和工作几十年读书学习积累的成果,因为占地方,不知清理过多少次了,丢了一批又一批,每一次看着那些熟悉又不得不忍痛割爱的书报,都会涌起许多温馨的记忆。

我自己订的第一份报纸是《文学报》,《文学报》创刊于1981年,是我国文坛、报坛第一张大中型综合性专业文学报纸。作为从小就喜欢小说、酷爱文学的我,某一天,好像是在《人民日报》还是别的什么杂志吧,看到它的创刊广告介绍后,自然而然成为它的拥趸。即使是参加高考复习最紧张的学习阶段,在化州二中复习时,我还经常到阅览室、化州文化馆那里翻阅这份报纸。1983年秋,我到那务中学补习复读后,因为一直跟着看这份报纸,而学校图书馆又没有,所以我便自费订了《文学报》。作为补习班的穷学生,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挤出钱来订一份报纸,足见我当时对文学的发烧程度。记得还有一个特别难忘的细节,当时刚好有一个从雷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分配回到该校任教的老师,他也订了一份《文学报》,学校分发报纸的勤杂工就以这位老师订的,把刚开始邮送来的一、两期都派发了他。我后来向收发室查问,这个负责同志还不相信一个补习班的学生会自费订一份报纸。在草这篇小文的日子,某天夜里翻手机,刚好刷到“今日头条”里一条消息:《文学报》自2025年1月起,不再独立邮发纸质版,并入《文汇报》,作每周一次的副刊推出。读到这条消息,想着当年节衣缩食订订追阅的这份报纸,唏嘘不已。

至于刊物,我长期订阅的是《小说月报》,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1981年开始,在高中毕业复习考大学那两、三年时间,一直订阅,正如阅读《文学报》一样,订《小说月报》也是缘于热爱文学、被小说故事情节吸引、想提高写作水平。《小说月报》是国内专门选刊其它杂志优秀小说作品的杂志,抱着一本在手,便可快速浏览国内众多杂志刊物小说之精品的目的。

读大学那几年,自然不用订报刊,图书馆有大量的书报、杂志,看也看不完。参加工作后,再也没有自掏腰包去订报纸,这倒不是自己不爱看报,或工作忙碌没有时间阅报,主要是单位里订有大量的党报、党刊,平时上班可在单位里阅读。工作几十年,我形成了自己阅报的习惯,即使出差在外,回来以后,我也会及时到办公室找出来出差期间还未阅看的《人民日报》《南方日报》《茂名日报》和系统相关的业务报刊,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决策以及本地的重点工作进展、动态。结婚成家后,家里开始订杂志,自然还是我一直喜爱的《小说月报》,也订过《中篇小说选刊》、《散文》、《知音》等杂志,还有就是儿子在不同年龄段阅读的一些知识类读物。每年年底,都会在家里商量,列出清单,专门到邮局进行征订。只是到了最近这十年,随着网络、自媒体的兴盛,儿子上了大学,到外面工作,家里已经没有再在邮局订报刊了。家里堆积无数的书报杂志,我清理了好几回,一批批被作为废品卖掉,唯有《小说月报》至今一份我都舍不得丢掉。前些时候,我整理书房,翻出几期1981年的《小说月报》,纸质已发黄,看到当年阅读里面一些篇目,为掌握好词语、好语句,自己划画的重点标记,当年苦读的情景又浮现眼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工作的第一个部门是市委统战部。省委统战部当时创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宣传刊物《粤海同心》杂志,每年下半年总会召开一次宣传发行工作会议,总结工作,对订阅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安排第二年的发行任务。记得有一年,茂名市委统战部因发动一位热心企业家出资几万元征订该刊,影响较大,取得那年的先进单位,省委统战部还专门表扬、介绍、推广我做法,希望各地学习。我第一次参加《粤海同心》杂志发行会议是1993年9月,会议地点在韶关,先坐三茂线火车到省委统战部,再换一乘省部的大巴车前往韶关,来回五天,是我平生第一次到这个粤北城市,印象很深刻。我在市委统战部工作期间,曾有两段时间在秘书科工作,那些年,每年都要花上很大一部分精力去发动各单位、一线人员、各地订阅这份刊物,才能完成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初,上级为减轻基层负担,对各系统的宣传刊物进行撤并,《粤海同心》业务并入了《南方》杂志,曾经的《粤海同心》杂志停刊。这份杂志是我的良师益友,使我学到了许多统战理论、政策和业务知识以及各地工作经验,促进自己水平提高,伴随了我进步成长,至今,我仍保留着《粤海同心》从创刊到停刊的每一期杂志,成为我人生工作的一个印记。

2014年6月,我到了市直机关工委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每年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党报党刊的征订发行,党费的用途中,有一项就是用于征订党报党刊。每年,市委宣传部分会同时市直机关工委、茂名日报社下发通知,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专门召开全市性的部署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以保证完成征订任务。市直机关单位和各级党组织都高度重视,认真落实,每年都能超额完成。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自己也没有放松要求,做到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坚持阅读写作,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每天刷新手机新闻,从信箱中取出《茂名日报》《茂名晚报》来阅读,以及翻读每月的《秋光》《中国老区建设》《源流》等杂志,成了自己一个习惯和必做的工序,当看到那些我们国家、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果的好消息时,心中更是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2014年6月,我到了市直机关工委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每年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党报党刊的征订发行,党费的用途中,有一项就是用于征订党报党刊。每年,市委宣传部分会同时市直机关工委、茂名日报社下发通知,做好党报党刊征订工作,专门召开全市性的部署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以保证完成征订任务。市直机关单位和各级党组织都高度重视,认真落实,每年都能超额完成。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自己也没有放松要求,做到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坚持阅读写作,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每天刷新手机新闻,从信箱中取出《茂名日报》《茂名晚报》来阅读,以及翻读每月的《秋光》《中国老区建设》《源流》等杂志,成了自己一个习惯和必做的工序,当看到那些我们国家、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果的好消息时,心中更是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

农村记工分的往事

罗本森

说起记工分,农村上年纪的人都记忆犹新,年青一代多不知是怎么回事,这段往事已过去40多年,成为我国农村的一个时代缩影,在历史长河上烙下深深的印记,曾给多少人留下岁月的心酸。

1958年7月,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生产建制。公社是基层政权单位,上受县领导,下领导大队,大队领导生产队。生产队为基本独立核算单位,接自然村划分,一般几十人到百多人不等,村民普称为“社员”,实行集体化,统一生产、统一分配,为充分体现“按劳计酬”的分配原则,便诞生“记工分”的制度。社员出勤干一天活,晚上记工分员详细记在工分本上,作为月结和年终分红的依据。谁家的工分多,意味着分配粮食、杂粮、金钱就多;谁家的工分少,分配自然就少,有的人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不仅分不到钱,还成为队里的倒欠户,也就俗说的“超支”。

那个时代,我在校读书,放学或放假回来也参加生产队劳动,读初中时一天是4分,读高中时是6分。高中毕业回乡不久,被抽调大队、公社做工,每月记300分回生产队参加分配。我家当时人口多,劳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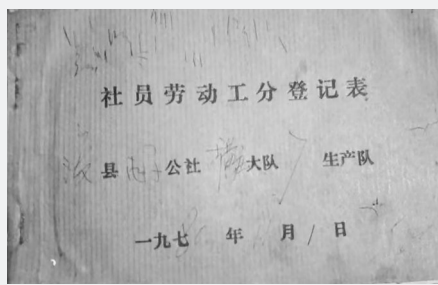
自然挣工分就少,年年都“超支”。工分在社员心目中很有分量,不仅体现了他们的劳动价值,更是他们生活的依靠和希望。邻队有位社员闹了个笑话,年夜写了副“今年超支,明年盈余”的对联贴在门上,这副对联很现实,也有点辣味,还道出主人的追求,没什么过不去。但到了大年初一早起才知变味了,只好把它撕掉。

每个人的工分底有所不同,每年进行公评一次。根据体力强弱与劳动能力大小确定底分,男劳力一天是10分,女劳力是8分。对一些体力较差的弱者、幼者适当降低几分。我生产队一天开三节工,按一天分三节平均计分。到了年中或年底,会计要把各户半年或一年所取得的工分进行合计,用这些工分参加分配。那年月分粮食,先按人头分给口粮,约占七成,接下按工分分配,约占三成,工分的差别体现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少劳少得。体现了人人有饭吃,这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农村实行公有制的具体体现。

有时生产队搞包工,比如挑沙,每担1分,挑得多一天挣到20分,比一般劳动一天高出一倍。有时将一定的生产任

务,按照劳动强度或时间预算出一定数目的工分,包给社员完成。比如三亩的稻子,包干给几位妇女去割,所得工分由她们平分。挖木薯时挑回来过称,按重量给工分,这样可以防止出勤不出力或拮据怕重现象,激发能人和青壮年社员的积极性。除了出勤得到工分,还有就是积肥给队里也记回工分,如人粪尿、草木灰交队里,经过称给回一定工分。还有一些做手艺的,如木匠、篾匠等,允许外出挣钱,但得向生产队交钱买工分。那个时期还没有探索出一种先进的管理制度,基本上就是粗放型的大锅饭式管理,激发不了能人和青壮年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发展缓慢,农村生活水平低下,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

评工记分作为一种管理体制,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关系。虽有历史局限性,但也为后来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借鉴。到八十年代初,落实生产责任制,各生产队就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耕作,到1983年10月结束人民公社体制,使农村改革的篇章揭开了新的一页。从此,历时二十多年的记工分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个时代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记忆。



迟到的纪念(上)

——回忆大伯往事

刘经国

十一·一、中秋假期,回洪湖老家参加堂妹女儿的婚礼。趁着亲人聚会的机会,堂兄和堂姐们按事先约定,将家里保存的几件老宝贝交我保管:一张大约拍摄于1956年的祖父母与父辈合照及底片,一封大伯于1980年9月4日写给三叔的家信。照片已部分损坏,底片也发生霉变;信件基本完整,只是右边一小竖条残损,呈锯齿状,缺失了几个字,疑为手工撕拆所致。

这封家信弥足珍贵,不仅因为内容充满兄弟之爱、家族之情,而且这是大伯的唯一手迹,也是大伯存世的仅有遗物。写完此信后几个月的一天夜晚,大伯突发心肌梗塞遽然离世。粗略一算,已经整整44年。

这勾起了我对大伯的回忆。

清晰记忆不多,却充满温馨悲怆

小时候我还去过五场大伯家,也许是大伯接我去度暑假。大伯和四娘商量,带我到总场场部。那时候在我们眼里,总场也是大地方。大伯的帆船不是用来打鱼的,而是编组队从事运输的。

我还记得大伯从五场回七场新盖老屋,四叔和四娘专门煮鸡蛋给大伯吃。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大伯,总是浮现出这一幕。

大伯出事后,那一次路过七场,我们和祖母跑到屋后大堤上,晚辈们用粗瓷碗给大伯

递上解渴的凉水,祖母半瞎的眼里流出干枯的泪。因为盼子心切、悲伤过度,祖母差点栽倒,从此身体每况愈下。

据说,大伯走的很突然。那天大伯和室友一起娱乐,大伯拉京胡,室友唱京戏,其乐融融。不想半夜突发心脏病,悄悄离世,第二天才被室友发现。

大伯去世后,室友有个同姓熟人给领导说:他的老家还有一大家子后人,请别急着火化,先等几天再说。但是消息传到总场,没人转告老家亲人。三天过后领导不见来人,决定立即火化。

这之后,老家亲人才得知消息。老兄弟姊妹们商量,决定让姑妈家的二表姐淑华和我大哥前去将大伯遗体接回。

那时正好二表姐的对象在那里的教师进修学院学习,她刚刚前去探望过。如果当时就得到通知,亲人们还可以见上最后一面,但是这成了永远的遗憾,也成为家族永远的伤痛。

大伯的骨灰装入接回时,鞭炮声立即响起,亲人们涌上大堤,记得堂弟年阶抱着遗像,走在最前面,另一堂兄弟抱着骨灰,大家脸色沉重,有的唏嘘

不已,有的默默流泪,四娘放声大哭。

生于小康之家,却未成年陷赤贫

早先我们家也算望族,祖辈是中医世家。前溪刘氏光绪谱记载,33世祖寿国公“业儒兼治歧黄”,即私塾老师兼中医师。过去医、药一体,中医师既坐诊也开药铺。34世祖远鹏公、35世祖道彬公(也称道一、道益)都是独子,到上世三十年代,家里还有几进几出的带天井的大院落。两位先祖继承了家业,算得上地方上的乡绅,有名望有地位有家产有事业。

但好景不长,因为国共合作破裂,延伸到地方——革命老区沔阳洪湖一带,民间也形成两个对立派别,老家所在沙湖镇铜盆窑也成了由红军领导的地方武装——赤卫队,一河之隔的石山港及到彭场一带成为国军为后盾的白(北)极会,为教室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聆听专家的讲解,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

1930年6月,白极会再次进犯铜盆窑。据沔阳(现为仙桃)

沙湖革命史志记载:“会首田国举、金家福等率众五百余人,沿东荆河、吴家到官垱一线进行烧杀抢掠,烧毁民房千余栋,杀死耕牛百余头,掠夺粮食三十余船,致使沔东苏区遭受严重破坏”。我们家祖传大宅加中医铺就在此次大劫难中,被白极会付之一炬。据父辈们讲,当时对方无从下手,只好抱来柴草,淋上植物油(有说洋油),放火烧了三天三夜,祖屋才化为灰烬。

曾祖父道彬公因为家势,原为乡村开明绅士,后转变为革命同情者,曾受铜盆窑赤卫队长李宝鼎之邀,在革命低潮时,利用宗亲关系到白区充当中和平使者。但是革命出现高潮时,苏区开展大规模肃反。

据沔阳沙湖革命史志记载:1932年5月,沙湖区在湘鄂西省保卫局股长和特派员的监督下,开始了错误的肃反运动,名曰“清党”“锄奸”,实则把一大批区乡党政军干部当作改组派,先后杀害于大码头后巷外坟地。祖父道彬公就是在这次肃反中被作为投降派、改组派冤杀。

原本家里7口人,曾祖

父、曾祖母、祖父、祖母、叔祖父、大伯、父亲。家境还不错,开有中药铺,还有田地耕种,兼事渔业,有祖传大宅,几代人同堂共处。曾祖父是地方贤达,一切当家作主。

自从祖宅被焚毁,曾祖父被冤杀;加上祖父长期患哮喘,干不了体力活,无法当家领事;叔祖父因家庭变故,精神受刺激,长年吃斋念佛,一辈子没有娶妻;祖辈从此立下家规,不许子女从政和参加党派。我三叔从参加工作起,即在铜盆窑农工部从事技术工作,干了一辈子水利,当了22年地方堤管段段长,但是始终未写入党申请书,做了一辈子党外干部。

祖宅被焚毁时,大伯才9岁;曾祖父被冤杀时,大伯仅11岁。我们一家子陷入鲁迅所说的“从小康陷入了困顿”。当然,他家最好的境况我们家没有享受过,但最坏的境况他家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至少他家还有祖屋财产可卖,我们家可是一贫如洗。

11岁大伯不得不辍学,带着仅9岁的弟弟(我父亲),在小脚祖母的带领下,担当起种植捕捞、当家领事的重任。

快乐的进修时光

沉醒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部队工作了十多年后的我,被部队选送到中山大学进修。与我一同踏上这段求知之旅的,还有另外两名军人,一名海军军干部来自东海舰队,一名陆军干部来自军队的科研单位,我则以空军干部的身份加入其中。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科研骨干。大家怀着对知识的渴求,相聚在中山大学。

进修的日子充满了快乐,课程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爱好选择。我主修的是空气动力学和天文学,这两门学科深奥的数学公式和外文字符,起初让我颇感吃力。那些复杂的推导过程,常常让我在深夜辗转难眠,脑海中全是各种公式和符号在盘旋。但我并未因此退缩,反而激发了内心强烈的求知欲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知识,我会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查阅大量的资料,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每攻克一道难题,我心中都会涌起满满的成就感。

为了调节学习节奏,我还兼修了中文和英文。在阅读中文经典文学作品时,我仿佛置

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篇篇佳作就像强大的磁石,紧紧吸引着这颗小小的铁屑。我沉浸在李白的豪放洒脱、杜甫的沉郁顿挫、苏轼的豁达乐观之中,感受着文字的魅力。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让我在紧张的专业学习中得到了放松,更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学习英文的过程同样充满乐趣。我的英文启蒙是在中山大学才开始的,此前,我一直学的是俄文。教我英文的李教授,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中美高级代表团谈判签订停战协议的首席翻译,精通中、英文。他的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总能让我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知识。在他的指导下,我从零开始,不断地背单词、读课文。经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能够看懂本专业的英文原文,并且在高级职称考试中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当了一汇院士、陈世训教授等著名专家授课时,一百多

人的阶梯大教室里座无虚席。此时,一身橄榄绿、一身海军白、一身蓝天服,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就像万绿丛中绽放的花朵,为教室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大家都全神贯注地聆听专家的讲解,眼神中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

我们就餐就在中山大学的食堂,那里的饭菜物美价廉,每份荤菜、素菜都是1元。我中餐喜欢吃一份小乌鲢鱼,晚餐则来一份鸡蛋羹。虽然工资不高,每个月都成为“月光族”,但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为学习补充能量,我心里也觉得满足。

平时,我们三位兵哥走在校园里,总能感受到师生们对军人的尊重。认识我们的人会主动打招呼,有的还会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前面。这种“民拥军,军爱民,军民鱼水情”的氛围,让我们倍感温暖。还有不少人向我们咨询如何能被选送到部队院校学习,我们也会

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供他们参考。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也会适当地放松心情。有时,我会邀请两位兵哥或要好的朋友,从中山大学的后门坐船一起向北穿越珠江。登上对岸,南方大厦就巍然矗立在眼前。买完所需的物品后,我们沿着原路返回学校,一路上欣赏着珠江秀丽的风光,江风拂面,心旷神怡,所有的疲惫都随之消散。

有时,我还会步行到石榴岗去看望老同学。我和他曾一起在黄冈高中和军校求学,如今在异地重逢,格外亲切。每次相聚,我俩都会畅聊许久,回忆过去同窗的美好时光,分享当下的生活乐趣和学习心得,同学情谊在相互交流中愈发深厚。

中山大学环境优美,范围宽广,花园小径繁花似锦,图书馆里静谧祥和。空闲时,我喜欢在花园里漫步,感受大自然

的美好;也喜欢泡在图书馆里,遨游在书的海洋中。那里有丰富的藏书,无论是专业书籍还是其它作品,都能让我沉浸其中,享受学习的快乐。

我们这次进修都带有专门的课题任务,与来自相关大学的专家和各省的科研人员一起从事专题研究。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大家齐心协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们日夜奋战,每一次成功都让我们无比兴奋。最终,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带着满满的收获和不舍,返回各自的部队和单位。

这段在中山大学的进修时光,成了我人生中一段非常珍贵的过往。在这里,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收获了快乐和友谊。我体会到了求知的乐趣和学习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师生们的热情友好。这段经历将永远激励着我,在今后的道路上,保持求知若渴的心态,享受学习的快乐。